

田代

文集

1

田原

文集

装帧设计：曹辛之

田汉文集（一）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水电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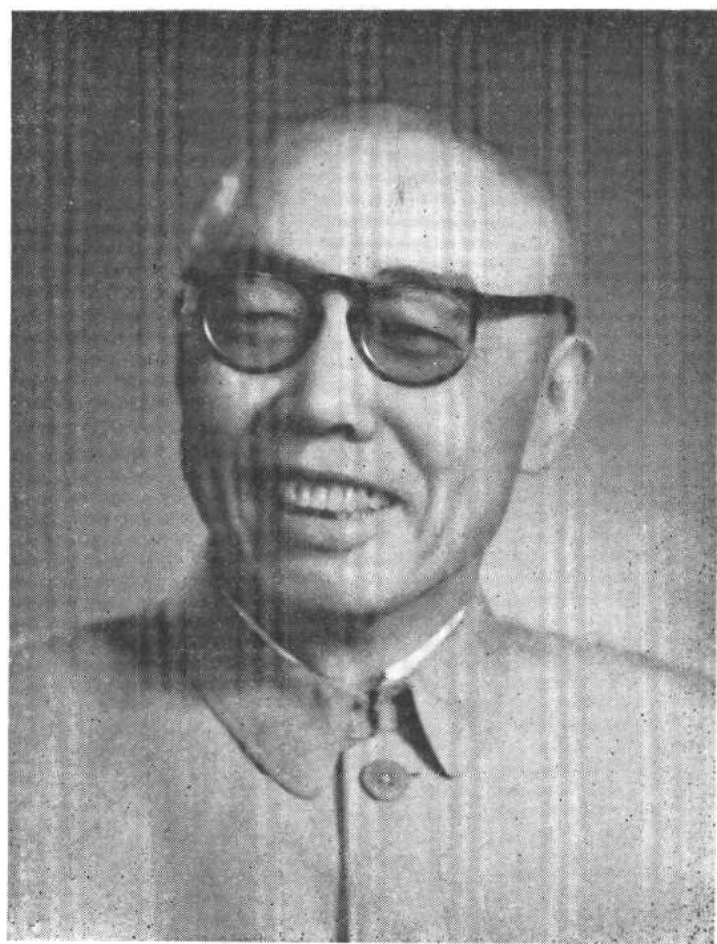
字数293,000 850×1168 1/32 印张15.75 插页(平)7(精)10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平）1—8,700册（精）1—3,700册

统一书号：10069·479 定价：（平）2.30元

（精）3.40元



田 原

《田汉文集》编辑出版说明

本文集辑录田汉同志一生有关文学艺术方面的重要著作，计十六卷。第一卷至第七卷为话剧、歌剧剧本创作，第八卷至第十卷为戏曲剧本创作，第十一卷为电影剧本，第十二、十三卷为诗歌，后三卷为文艺论著及其他，均按写作年月先后编次。作者的著作年表则附在最后一卷。

本文集的全部文章，在这次编印时，均曾根据收集到的不同版本进行校勘，并增加了一些简注。

在资料收集方面，由于战争和“十年浩劫”带来了许多困难，自难免有所遗漏；在编辑和出版方面，我们的工作也有不当之处，恳切希望读者和从事研究工作的同志指正。

田汉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五月

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田汉

——在田汉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

(代序一)

茅盾

“五四”以来中国文艺界的一位杰出的戏剧家——田汉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一年了。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为田汉同志举行追悼会，为他恢复名誉，平反昭雪。田汉同志是我党优秀党员，是忠勇无畏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是我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曲改革运动的先驱者，又是我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的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人。

田汉同志为新文艺事业奋斗数十年，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特别是戏剧、戏曲工作者有最密切的联系，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篡党夺权，首先在文艺界打开缺口，因此早在一九六四年，就对田汉同志罗织罪名，阴谋陷害，文化大革命初期，更对他肆意摧残，百般凌辱，必欲置田汉同志于死地而后快。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田汉同志负屈含冤，瘐死狱中。终年七十岁。田汉同志的逝世，是我党、我国文学艺术界的重大损失。

田汉同志字寿昌，湖南长沙人，生于贫农家庭。早年得亲友资助，留学日本，五四运动起，他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和创造社，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一九二〇年起，他先后写作了《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等剧本，并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哈孟雷特》、《罗米欧与朱丽叶》，开始他的戏剧事业。

一九二二年田汉同志回国后，编辑出版了《南国》半月刊，创办了南国电影剧社，拍摄了电影《到民间去》。一九二七年在上海艺术大学任教，被推选为校长，又拍摄电影《断笛余音》，并举行著名的“艺术鱼龙会”，演出了他的剧作《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开拓了我国戏剧运动的新路。一九二七年冬天正式成立南国社并即创办南国艺术学院。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底，田汉同志率领南国社先后在上海、杭州、南京、广州、无锡各地举行多次话剧公演和其他艺术活动，创作了大量的剧本，其中《火之跳舞》、《一致》等剧的创作和演出，标志着中国话剧进入革命戏剧运动的新阶段，影响及于全国。田汉同志在极其艰苦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为以后的左翼戏剧、音乐、电影运动培养了骨干。

一九三〇年，田汉同志在党的影响下，在无产阶级戏剧运动的推动下，写了著名的《我们的自己批判》，清算了自己身上小资产阶级的浪漫、感伤倾向，公开表示向无产阶级转向。他参加了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翼作家联盟。

六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南国社举行第三次大公演，继艺术剧社之后，遭到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南国社被查封。这一反动行动，激起了上海进步戏剧界的大联合，诞生了左翼戏剧家联盟。

田汉同志于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国共产党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他为左翼剧联领导的各剧团写了《梅雨》、《姊姊》、《乱钟》、《战友》、《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等大量话剧和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以鲜明的革命立场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在左翼剧联领导下成立了音乐小组，田汉同志写了许多振奋人心的歌词，他和聂耳、冼星海、张曙等同志合作的大量的革命歌曲，其中如《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都曾广泛流传，吹响了抗日救亡斗争的号角。《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国歌。田汉同志与夏衍、阳翰笙等同志参加艺华影片公司，编写拍摄了许多进步电影。这些工作，占领了白区广阔的艺术阵地，敌人惊慌失措，于一九三三年以“电影界反共锄奸团”名义捣毁了艺华影片公司。一九三五年春，中共江苏省委、文委被破坏，田汉同志被捕。一九三五年秋，田汉同志经营救保释。一九三七年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为田汉同志恢复了党的关系。

七七抗战开始，田汉同志立刻写出群众性抗日话剧《卢沟桥》，参加组织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并亲赴淞沪前线劳军。上海沦陷后，田汉同志到武汉，参加以郭沫若同志为第

的政治部第三厅。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组织了十个抗敌演剧队和四个抗敌宣传队和其他剧团，在各战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田汉同志同时团结广大的地方戏曲艺人，为他们编写了《新雁门关》、《江汉渔歌》等戏曲，鼓舞他们进行抗战爱国宣传。一九三九年后，田汉同志在桂林主编《戏剧春秋》月刊，写了话剧《秋声赋》和戏曲《岳飞》及许多戏剧论文。一九四四年田汉同志和欧阳予倩等同志在桂林组织了有八个省区几十个团队参加的西南戏剧展览会，是一次在国统区抗日进步演剧的空前大检阅。

抗战胜利后，田汉同志在上海写出《丽人行》、《忆江南》等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戏剧和电影剧本。一九四八年他转入华北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后，田汉同志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和党组书记，全国文联副主席等职。并被选为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田汉同志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对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委员长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坚决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认真执行中央的戏改方针，团结全国戏曲艺人，实行“三改”，在党的戏改政策的正确指导下，我国各个古老剧种大放异彩，获得新生，戏剧队伍不断壮大，戏剧事业日益繁荣发展，都是和他的辛勤工作分不开的。他努力创作，写出了话剧《关汉卿》、

《文成公主》及戏曲《白蛇传》、《谢瑶环》等作品，使他在历史剧创作和改编方面达到了新的更高的成就。

田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不断追求光明与真理的一生。他为人热情豪放，光明磊落，对同志、对人民同患难，共呼吸，对党和党的事业忠心耿耿，锲而不舍。我们要学习、继承田汉同志的这些优秀品质和战斗精神，要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为繁荣我国的文艺事业，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把我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安息吧，田汉同志！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悼念田汉同志

(代序二)

夏衍

经过十年浩劫之后，老朋友们见面时，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活下来就是胜利。”这是对的。活下来，才能看到林彪、“四人帮”的覆灭；活下来，才能看到新长征的开始。但是，我认为，一个人只要走正路，人有人品，艺有作品，那么，即使人死了，也不会象林彪、“四人帮”所说的那样“永世不得翻身”。最近，党中央给被戴了四十三年“四条汉子”的帽子，被打成“三反分子”，而终于在十一年前离开了我们的田汉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开了规格很高的追悼会，吊者近二千人，当沈雁冰同志宣读悼词的时候，许多人流了热泪，这种情况不就说明：田汉同志虽则死了，但他还是胜利了。

“五四”之后不久，我就看到郭沫若、宗白华、田汉三人合作的《三叶集》上田汉写的文章。两年以后，一九二三年，我在日本念书，翻译了一本有关戏剧创作的小册子。由于上海没有熟人，就寄给他介绍出版，但一直没有回信。过

了一些时候，我回到上海，到日晖里去看他，他根本忘记了这件事，说没有，记不清楚了。我以为一定是寄丢了。可是不久，我在书店里看到了已经出版的这本书。到良友图书公司去一问，在他们的本子上明明写着：此稿由田汉介绍，翻译者所在不明。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交往，这件事也很能表现田汉的性格。

我和田汉的再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二四年。那也是暑假时，我回到上海去看他，还没来得及讲话，他就把我一把抓住，让我坐在一张藤椅子上，说：“别动，要拍电影。”原来，这时他正在和一个俄国人合作，拍一部叫《到民间去》的电影。我去找他，正好成了送上门来的临时演员。这大概就是我第一次上银幕。自此以后来往多了，也通过信。在我心目中，田汉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作家，特别是他写的那些剧本，如《获虎之夜》，使我很受教育。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我回到上海，搞了两年工人运动，和他没有来往，但也看过一次南国社演出的戏。一九二九年冬，开始筹备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蒋光慈同志提出邀田汉作为发起人。当时有人是反对的。但经过讨论，许多人说，田汉他不单单是一个人，在他的南国社周围，有一大批人，而且其中不少是革命的。这样，就由蒋光慈去征求他的同意。他非常高兴地参加了“左联”，当了“左联”的发起人，而且参加了“左联”的成立大会。在这前后，我和冯乃超、叶沉（沈西苓）、石凌鹤等组织了一个上海艺术剧社，演出了一次话剧。当时，我们这些人中除去叶沉

之外，几乎全是外行，而戏又的确演得不好，因此，当我知道彩排那天发了请帖给田汉、洪深、应云卫等人时，我非常担心，怕会受到不好听的批评。但是，看完戏之后，出乎意料的是不仅田汉，包括洪深、应云卫，都一致对我们表示鼓励。田汉并对南国社的一些朋友说：你们看看，他们搞得比我们好。这件事使我得到很深的印象。从一九二九年起，田汉不仅参加了进步的文艺活动，而且参加了进步的政治活动。他参加了自由运动大同盟，参加了“互济会”。当时，蒋光慈正在和南国社的一位女演员吴似鸿讲恋爱，三天两头到南国社去，光慈又是一个善谈的人，因此，他跟田汉就每天谈到半夜三更，谈苏联的事，谈马雅可夫斯基，谈中国的革命，谈中国的话剧运动等等。不久，也就是一九三一年冬（据我的记忆），光慈告诉我，田汉已经决定申请入党。请记住，三一年这一个年头，是上海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而田汉，就是在这一个年头申请入党的。此前不久他还发表了长达数十万言的自我检讨，对过去的生活、思想、作品作了深刻的自我解剖。田汉当时已是文艺界知名之士，敢于这样做是难能可贵的。在“四人帮”时期有一些人写了不少很不光彩的东西，而直至今日还不敢作一点自我批判，甚至还在大写文章，为自己涂脂抹粉。

田汉是一个有高度革命精神的爱国主义者，是一个英勇的革命家。但是，在革命队伍中，他却是一个很有特性的，也许可以说很不平常的人物。他最突出的特点，或者说是个性，我说叫作“无我”，他根本不考虑自己。不管他写书、

演戏、办杂志、搞剧团，甚至于请客吃饭，在他心目中从来不考虑到钱的问题。有了钱，比如一本书出版了，拿到一点版税，就大伙用；用完了，没钱了，就大家掏腰包，买大饼油条过日子。有人说他们是法国的波希米亚式的文人，有人说他们是原始共产主义者。解放前，田汉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但是，有人要他帮助，他无不乐意替他们出力。大概在一九三四年，有一天我正在他家里，一个朋友被捕，因此和他牵累的人被迫要搬家，没有钱，向他来告急。田汉想了一想，就说：“你等着，我去想办法。”不久，他拿来了五十块钱交给这个同志，说：“有了，够了吗？”原来是他一个朋友、南开大学教授张彭春正在计划陪梅兰芳到美国去，他就向张借了这笔钱。这就是一个例子。他不考虑自己，不考虑到社会上的一些必须要注意的事情，也常常会出一些所谓奇事、怪事，因此有人说他不懂得人情世故。在话剧界，“田汉请客”这句话，已经成为一句大家通行的歇后语了。比如，他身无分文可以邀许多人一起到菜馆去吃饭，吃了之后无法付账，就大家掏腰包来解决。有的时候，甚至于凑不够钱，留下几个人质，分头去找钱来付账。你说他有意这样做吗？根本不是的。他从来就没有考虑到请客吃饭要花钱这一件事。所以，“田汉请客”的下半句就是：“得自己带钱！”

假如说有天才的话，那么，我认为田汉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他诗才敏捷，这是谁都知道的。他可以随时写出一首非常精采的诗来。写剧本也是如此。常常在一个晚上吃饭的时候，或者闲聊的时候，谈起某一个问题，一下他就说：几

天之后你们来拿剧本。当然，他约的期限是常常不准确的。但是，他的确已经准备好了、并且想好了这个戏的主题、思想、人物、个性等等。他常常替演员写剧本，这在我也觉得是很难能的事情。有些演员找到他说：“老大，我好久没有戏了，请你给我写个剧本。”他就毫不迟疑地答应下来。这样的事情很多，后来甚至成了一笔账，写在他的一块小木板上：某某人某某戏等等。甚至于在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搞艺华公司时，他可以为一位大力士专门写一个剧本。这种事情在戴白手套的有洁癖的知识分子中，是很难想象得到的，也是很难有这种本领的。

五四运动以后，文艺界分了两派，一种叫做新文艺派，一种叫做旧文艺派。既有新和旧、也有洋和中的问题。因此，在每一个艺术领域里面，都常常发生这种新旧、中外之争。例如美术界有西洋画和中国画，音乐界有洋嗓子和土嗓子的問題等等。有时甚至为这种问题闹得很不愉快。但是我总觉得在戏剧界，话剧和戏曲这方面，从来没有不团结的问题，应该说是团结得比较好的一个艺术部门。理由何在呢？我想主要是由于我们中国话剧的三个奠基人，即欧阳予倩、田汉、洪深，他们三个人一方面都是中国话剧的奠基人、创始者；而同时，他们又对于中国戏曲有比较深刻的研究、造诣和爱好。因此在话剧界与戏曲界之间就团结得比较好，争论也比较少，合作得是很好的。我小时候也看过草台戏，也陪着母亲去看过一、二次京戏，但是，对于中国戏曲完全不懂。特别是我在“五四”运动之后，受了“把线装书

丢进茅屎坑”的影响之后，对于京戏、地方戏一律采取不看、甚至歧视的态度。我还对人说过：听到大锣大鼓就感到头痛。可是，三十年代以后，田汉不止一次拉我去看京戏，说：多看看就懂了，懂了就欢喜了。但是，直到全国解放，我除了在四川、桂林一段时期，对于桂剧、川剧比较爱好以外，京剧、昆曲这样的戏，我是看了就会打瞌睡的。我的这种思想情况，田汉当然知道的，但他没有和我深谈过。到了全国解放，有一次他到上海来，就很严肃地对我说：你知道全国有几个话剧团？全国有多少京剧团和地方戏剧团？我一时答不上来。他说：这个问题现在你应该仔细想一想了。我们都是提倡话剧的。话剧当然在对当前的教育意义上讲，作用比戏曲大，但是，我们这支队伍还是太小，我们的技巧也还很差，而京剧、地方戏的影响是大得多。这一句话使我想起了——一九四九年七月我离开北京到上海时，周恩来同志对我讲的那一段话，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对我说，你到上海，一定得先到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他们那里去登门拜访。不要请他们到机关里来谈话。因为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要比你们搞话剧的人大得多。我后来开始在这方面思想有了一点解放，这件事，他的这一段话，对我说来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田汉还有一个优良的特点，这就是紧密地和群众联系在一起，和他们共呼吸、共患难。不用说南国社时期以及左翼时期那种吃大锅饭、一起过困难日子的时候了，就是在解放以后，他当了艺术局长，当了剧协主席之后，还是不论对哪一个剧种，哪一位演员，或者剧团里的哪一种人，他都一视同

仁，把他们当作兄弟姐妹，因此，没有一个人把他当作一个首长或者官来看待，而把他当作是一个敬爱的领导。一九五七年鸣放，他就是为了为演员的青春请命和为民请命这两件事情而挨到批判的。现在想来，他的主张完全是对的。他把每一个演员都当作自己的亲人、兄弟、姐妹，替他们着想，考虑他们的问题，而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他们的上司。这一点是有目共睹、谁也不能否认的。这恐怕也就是有这么多人参加他的追悼会，而听到悼词时禁不住流下眼泪的原故吧。

人，总是有缺点有错误的，特别是象我们这样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田汉的错误也是很明显的，特别是他的自由主义（我说的自由主义不是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消极性的自由主义，而是也许可以叫做过于积极的自由主义，就是不应该他去做的事情，他去做，应该请示的，不请示，而先斩后奏等等，这类事，在他说来是很多的），但是，尽管如此，有自由主义和其他毛病，田汉同志的大节是无愧的。在这儿我要说一说他在南京演戏的事情。一九三五年二月，江苏省委破坏，阳翰笙、田汉同时被捕。最早被关押在龙华国民党监狱，和强盗、绑匪、小偷关在一起。几天之后，林维中同志带着田野去探望，他托林维中带回一张小纸条，要她交给我和孙师毅，纸上写了一首七律：

平生一掬忧时泪，此日从容作楚囚。

安用螺纹留十指，早将鸿爪付千秋。

娇儿且喜传书字，剧盗何妨共枕头。

目断风云天际恶，手扶铁槛使人愁。